

第一章

对权力的冲动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的不同，是漫无边际的，而且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蟒蛇吃饱了就去睡觉，一直睡到食欲恢复的时候；如果说别的动物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它们的食物不够或是因为它们害怕敌人。除了个别的例外，动物的活动是受生存和繁殖的基本需要的驱使，一般不会超出这些需要所必须的范围。

人却不然。的确，大多数人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辛勤劳动，以致剩不下多少精力去用于其他目的，但是那些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也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赫西斯出征雅典时，他并不缺少衣食和妻妾。牛顿成为三一学院院士之后，物质上的舒适得到保证，但他正是在此之后才写出《原理》一书。圣弗朗西斯和伊格内修斯·洛伊拉并不需要创立教派来摆脱贫困。这些都是杰出人物，但是除少数极

其痴呆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具有此种品性，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甲夫人对她丈夫经营上的成功坚信不移，而且没有进济贫院之忧，但她希望比乙夫人打扮得好一点，虽然她可以用少得多的资金来避免患肺炎的危险。如果甲先生被封为爵士或当选为国会议员，甲先生和她都会感到高兴。幻想中所想像的胜利是无止境的，而人们一旦把这些胜利视为可能，就会努力使其成为现实。

想像是一种刺激物，它驱使人类在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

假如死亡现在就能到来，
那真是快事一桩，因为我害怕
我那灵魂会得到完全的满足，
再没有这样的舒适，
继续留在未知的命运里。

在那殊为罕见的绝对快乐的时刻，我们像奥塞罗那样渴望死亡，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满足是不会持久的。我们需要的那种持久的快乐，对于人类是不可能的：惟有上帝能够享受绝对的快乐，因为“王国、权力和荣誉”都是他的。人间的王国受其他王国的制约；人间的权力因死亡而夭折；虽然我们筑起金字塔或“与不朽的诗句联姻”，人间的荣誉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那些仅有些微权力和荣誉的人，以为再增加一点权力和荣誉就能满足，但他们错

了：这类欲望永无休止和满足，只有在上帝的无垠境界里才能得到安息。

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他们在这方面的欲望仅为想像暗示的可能性所制约。假如有可能，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上帝；少数人则感到难于承认这种不可能性。这类人是按照米尔顿的撒旦的模式构成的，他们像他那样，把高尚和不敬合为一体。我所说的“不敬”，是指不依赖神学信仰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否认个人权力的局限性。这种高尚和不敬的泰坦式的结合，在大征服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这种结合的某些成分，在所有人身上都能看见。它使社会合作成为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这种合作想像成上帝和他的崇拜者之间的合作，而将自己摆在上帝的位上。由此产生出竞争、妥协和管理的需要、反抗的冲动，以及动乱和周期性的暴行，并因此而需要道德来约束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坚持。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两种欲望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国国王的荣誉却多于权力。然而，一般说来，获得荣誉最简便的方法是获得权力，这尤其适用于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因此，总的说来，荣誉欲所引起的行为与权力欲所引起的行为完全相同，实际上，这两种动机可以视为同一的东西。

正统的经济学家，以及在这一问题上与他们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认为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动机，这是错误的。商品欲若与权力和荣誉分开，那将是很

有限的，因为一般的能力即可使其完全满足。真正上乘的欲望不会为物质舒适的嗜好所左右。立法机关以贿赂方式攫为己有的商品，或藏有经专家鉴定的古代名家作品的私人画廊，这些追求的是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得到舒适的住处。当舒适的生活得到保障时，个人和团体所追求的将是权力而不是财产：他们也许以追求财产来作为得到权力的手段，也许为获得权力的增加而放弃财产的增加，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的。

传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这一论点，不仅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也是极端错误的，它使人们对近年来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产生误解。只有认识到权力的嗜好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在本书中，我所注重的是证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权力，它的涵义与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能量相同。和能量一样，权力具有多种形式，如财富、军队、行政机关、舆论控制。这些形式中，没有一种可以视为隶属于它种形式，而且无一不是源于它种形式的。单独探讨某一种权力形式——比如说财富——的企图，只能取得部分成功，正如单独研究某一种能量形式将会存在某些缺陷，除非同时注意到它种形式才行。财富也许产生于军队或舆论控制，正如这二者也许产生于财富一样。社会动力学的法则只能从权力的角度，而不能从这种或那种权力形式的角度加以阐述。过去，军队被单独分开，结果，胜败似乎完全取决于指挥员的意外才能。现在，经济权力被普遍认为是产生其他各种权力的泉源，我以

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正像那些因其影响已不合时宜的纯粹军事历史学家所犯的 error 一样。此外，还有一些人把宣传视为权力的基本形式。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意见，它在诸如“真理至圣，将来总会胜利”、“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类自古相沿的格言里已有具体体现。这种意见的真伪程度与上述军事观点或经济观点大体相同。宣传如能造成一种近乎一致的舆论，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那些能够控制军事或经济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就会把这用于宣传的目的。我们再以物理学来作比喻：权力和能量一样，必须视为是能够不断地从一种权力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权力形式，因此探索这些变化的法则，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把任何一种权力形式单独分开的企图，在当今时代，尤其是把权力的经济形式单独分开的企图，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是实践中屡犯重大错误的根源。

不同社会关于权力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个人或组织所具有的权力的程度不同，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加，国家现在显然要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权力。其次，极有势力的组织的种类不同：军事专制集团、神权政治集团和富豪统治集团是截然不同的种类。第三，获得权力的方法不同：世袭王位产生高贵人物，伟大教士所需品性产生另一种人，民主产生第三种人，战争产生第四种人。

在不存在贵族政府或世袭君主政体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地方，能够得到权力的人数受到限制，广义地说，最渴望权力的人就是最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因此，在权力之门对所有人敞开的社会制度里，能够授与权力的职位，通常为那

些好权之心非同凡响的人所占据。权力的嗜好虽然是人类动机中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它分配得很不公平，而且受到其他动机的限制，如舒适的嗜好、娱乐的嗜好，有时还有赞许的嗜好。权力的嗜好在怯懦者身上伪装成服从领导的冲动，这扩大了胆大者权力冲动的范围。权力冲动并不强烈的人，对于重大事件的进程大概不会产生很大影响。一般说来，引起社会变革的人是那些非常希望这样做的人。因此，权力的嗜好是那些最终成为显赫人物的一个特点。当然，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人类的唯一动机，那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会使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因果规律时深陷歧途，因为权力的嗜好是产生社会科学所需研究的变革的主要动机。

社会动力学的法则——我是这样主张的——只有以各种形式的权力为依据才能得以阐明。要发现这些法则，首先必须将权力的形式进行分类，然后再对组织和个人支配人类生活的方法的各个重要历史先例加以回顾。

我始终抱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提出我自信比经济学家们所提供的要恰当的关于社会变化的一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使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变得比那些其想像力受 18 和 19 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要容易理解。这两个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我们目前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恢复早期所流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及其需要，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不受 19 世纪公理过分支配的可能的进步形式。

第二章

领袖与追随者

权力冲动有两种形式：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在其追随者身上是隐含的。人们愿意追随领袖，以便使他所领导的团体获得权力，他们觉得他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自己不具备领导他们的团体赢得胜利的能力，因此总要找出一个似乎具有获取最高权力所需勇气和远见的首领。甚至在宗教方面，这种冲动也有表现。尼采指责基督教反复灌输奴隶道德，但最后的胜利总是目的。“温顺之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继承这块土地。”下面这首众所周知的圣歌表述得更为明确：

上帝的儿子奔赴沙场，
夺取王冠。
他那火红的战旗在远处飘扬，
谁是他的士兵？

谁能畅饮悲哀之酒，
战胜痛苦，
谁能忍受十字架的折磨，
他是他的士兵。

如果这是一种奴隶道德，那么每个能够忍受战斗之苦的士兵和每个努力竞选的普通政客都应视之为奴隶。但是事实上，在一切真诚合作的事业中，追随者在心理上和领袖一样，完全不是奴隶。

这使得人们能够忍受组织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权力不均，并且这种现象会随着社会越发有机化而不断加剧。

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源于我们的知识所能追溯的远古。这一部分是因为外界的需要，一部分是由于人性内在的因素。大多数集体企事业都非得有一个董事会来领导不可。要建造一幢房子，必须有人设计好方案；要在铁路上行驶列车，时刻表决不能由司机随意决定；要建筑一条新路，必须有人规划它的路线。即使是民主选举的政府，也毕竟是政府，因此，根据与心理学毫无关系的理由，如果要使集体企事业获得成功，既要有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有服从命令的人。但是这所以成为可能，特别是权力实际上的不平等超过技术因素所要求的这一事实，只能从特殊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些人的品性使得他们总是命令他人，有些人则总是服从他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大批普通人，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喜欢命令他人，其他情况下则愿意服从领袖。

艾德勒在他所著的《认识人性》一书中对顺从型人和专横型人加以区分。他说：“奴性的人总是按照他人的法规生活,这种人近乎强迫地要找到奴隶地位。”他接着说,另一方面,专横型人则总是问：“我怎样才能居于一切人之上？”在需要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就会被发现,而且在革命时期往往取得最高职位。艾德勒认为这两种人都是不应当有的,至少他们的极端形式是这样,他把这两种人视之为教育的产物。他说：“官方教育最大的害处是,它使儿童产生权力的理想,并向他们展示获得权力所具有的愉快。”我们也许可以补充一句：官方教育在产生专制型人的同时,也会产生奴隶型人,因为它使人感到两个合作者彼此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只能是一个人指挥,一个人服从的关系。

各种有限形式的权力嗜好几乎是普遍的,但它的绝对形式却是罕见的。一个有权管理家务的女人也许害怕首相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与此相反,林肯虽然不怕统治美国,但却不能应付家庭内战。假如‘贝勒丰’号船失事,拿破仑也许会逃到小艇上,驯服地听从英国军官的命令。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眼前事务时,他们就会喜欢权力,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时,他们宁愿追随领袖。

顺从的冲动和指挥的冲动一样现实、一样普遍,它来源于恐惧。无法无天的孩子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失火),会绝对服从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命令；欧战爆发后,潘克赫斯特的信徒们和劳埃德·乔治言归于好。凡有重大危机时,大多数人的冲动是找到一种“权威”并服从它。在这种时候,很少有人幻想革命。当战争爆发时,人民对于政府也有类似

的感觉。

组织并不一定是为应付危险而构成的。经济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如煤矿)含有危险性,但这些危险是意外的,如果得以排除,那组织将会更兴盛。总的说来,应付危险并不是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而且也不是管理内务的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但是海上救生队和消防队却和陆海军一样,是为应付危险而建立的。在间接的意义上,宗教团体也是如此,它们所以存在,部分是为了减少深埋在我们天性中的形而上学的恐惧。如果有谁对此表示怀疑,请他想一想下面这类圣歌:

时代的岩石为我裂开,
让我把自己深藏其间。

或者:

当汇合之水滚滚而来,
当急风暴雨折木飞屋,
耶稣,我灵魂的情人,
让我朝你的胸前飞去。

服从神的意志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曾使许多不服从任何尘世之人的君主对宗教表示谦卑。服从源于恐惧,无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

侵略往往也是源于恐惧,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

我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绝对。就某一种侵略而言，这是不错的，例如 D·H·劳伦斯的侵略。但是，我很怀疑做了海盗的人是否正充满着他们父辈所曾有过的恐怖，或者拿破仑在奥斯特里齐时是否真地感到他正在报复梅里夫人。我对阿蒂拉的母亲一无所知，但我十分怀疑她将她的宝贝宠坏了，以至他后来感到世界令人厌恶，只是因为它有时违背他的意念。我认为，怯懦所产生的那种侵略不是那种能够鼓舞伟大领袖的侵略；伟大领袖大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心，它不仅在表面上，而且深入到下意识里。

领袖所需自信心的产生，有多种方式。在历史上，一种最普通的方式就是世袭的统治地位。例如，读了伊丽莎白女王在危急时刻的演说，你会发现君主高于那女人，使她相信，再通过她使全国相信，她知道必须做的事情，而这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希望做到的。这样，人民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并行不悖；这是她成为“贤明的贝斯女王”的原因。她甚至可以称赞她的父亲，而不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毫无疑问，发号施令的习惯使人易于承担责任并迅速做出决断。服从世袭首领的部落也许比通过抽签选举首领的部落要优越。另一方面，类似中世纪教会这种团体总是根据卓著的功绩来选出它的首领，而且通常只有那些已担负重要行政职务的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当选，这种团体平均得到的结果较之同时期的世袭君主国家所得到的结果要好得多。

历史上几个著名的极有才能的领袖是在大变革的形势下崛起的。让我们暂且探讨一下使克伦威尔、拿破仑、列宁获得成功的那些品性。这三个人都是在困难时期支配着他

们各自的国家，并赢得本性不喜欢服从的能人们的自愿服从的。这三个人都具有无限的勇气和自信，并能做出为他们同事所承认的困难时期的正确判断。然而，在这三个人中，克伦威尔和列宁属于同一种类型，拿破仑则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克伦威尔和列宁是具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是非人类意志的指定执行者。因此，他们的权力冲动在他们看来是绝对正当的，他们对于诸如奢侈和舒适一类权力的报酬毫不介意，这些报酬和他们对宇宙的意志合为一体是不能调和的。这尤其适用于列宁，因为克伦威尔在其晚年自知陷入罪恶。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信仰和巨大才能的结合给他们以勇气，并使他们能激励他们的追随者相信他们的领导。

拿破仑与克伦威尔和列宁相反，他是行伍之人的最高典范。法国革命使他时来运转，因为它给他提供了机会，否则他对革命是不会关心的。虽然他满足了法国人的爱国心，而且以此为依托，但法国也和这次革命一样，对于他不过是一种机会。他在青年时代甚至怀有为科西嘉而反对法国的意念。他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性格上的特殊品质，不如说是由于他战术上的高超：在别人会失败的时候，他却是胜利者。在千钧一发之际，如二月十八日政变和马伦哥战役，他的胜利是依靠他人取得的，但是他有奇特的本领，能将他助手的功劳据为己有。那时法国军队充满了野心勃勃的青年；使拿破仑在别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的，是他的智慧而不是他的心理。他对于他之星宿的信仰（这最终导致他的覆灭），是他胜利的结果，而不是他胜利的原因。

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希特勒应当归于克伦威尔和列宁这一类型，墨索里尼则应归于拿破仑这一类型。

行伍之人或海盗首领在历史上要比“科学的”历史学家所想像的更为重要。比如拿破仑，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人们的领袖，而这些人所怀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个人的：法国革命军把自己想像成欧洲的解放者，他们在意大利也这样被人看待，西德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看法，但是拿破仑本人除了有利于他自己的事业外，从未给欧洲带来更多的自由。非个人目的的借口并不是常有的。亚力山大也许可以着手将东方希腊化，但是他的马其顿人对他在这方面的战役是否有兴趣，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共和时代的最后一百年里，罗马将军们主要是出去捞钱，以及通过分配土地和珠宝取得士兵们的忠诚。塞西尔·罗兹声称对不列颠帝国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但是这种信仰赢得了一大笔红利，而他招募来征服马塔贝勒兰的骑兵则受到赤裸裸的金钱引诱。略有掩饰或百无禁忌的有组织的贪婪行径，在世界战争中曾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说过，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服从领袖主要是由于恐惧的作用。但是这很难适用于海盗，除非没有更和平的职业供他们选择。领袖的权威一旦建立，他就可以在反叛的个人中引起恐怖，但是在他尚未成为领袖，而且未经大多数人承认以前，他是不能引起恐怖的。要获得领袖的地位，他必须具有产生权威的杰出品质：自信心、迅速决断和采取正确措施的才能。领袖地位是相对的：恺撒能使安东尼服

从他，但是别人却不能。大多数人感到政治是困难的，他们最好还是追随某个领袖——他们的这种感觉是本能而无意识的，就像狗跟随它们的主人一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集体的政治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权力的嗜好，作为一种动机，受到怯懦的限制，而怯懦也限制了自我管理的欲望。由于有权比无权更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且权力还能使我们赢得他人的尊敬，所以撇开怯懦的影响不谈，人们自然希望得到权力。这种怯懦因责任心的习惯而减弱，因此责任心有助于权力欲的增强。残酷无情和冷若冰霜的经历可以在两方面起作用：对于那些胆怯之人，它产生避人耳目的愿望，而胆大之人却被刺激起来寻求他们可以实施暴戾，而不受虐待的地位。

在无政府状态之后，第一个自然步骤是专制，因为支配和服从的本能机制有助于此举的产生；这在家庭、国家和商业都有例证。平等合作比专制要困难得多，与本能更是相去甚远。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时，每个人自然会争取全面控制，因为服从的冲动在这里不起作用。一切有关人员几乎必须对他们以外的事情表示共同的忠诚。在中国，由于儒家尽忠家庭的观念，家庭事业往往成功；但是非个人的合股公司每易陷于困境，因为无人会对其他股东具有不能不诚实的动机。凡是实行政治协商的地方，若要获得成功，人们必须尊重法律，或尊重国家利益，或尊重各派都应遵守的某些原则。朋友会必须决定某项疑案时，他们既不投票表决，也不听从大多数人意见，而是一直讨论到“众所公认”，这种“公认”被视为是圣灵的指示。在他们这种情形，与我

们有关的是一种非常一致的团体，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政治协商是行不通的。

那种足以使政治协商成为可能的一致感，在下列场合容易产生：类似佛格和罗思柴尔德那样的家族、类似公谊会教徒那样的小型宗教团体、野蛮部落、进行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但是外部压迫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团体成员因害怕分裂而团结一致。共同的危险是产生统一性最简便的方法。然而，这并不能使世界上的权力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我们希望防止目前能够产生内聚力的那些危险，例如战争，但是我们并不希望破坏社会合作。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用类推法来判断，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某个民族的初期专制来解决。由于各民族已习惯于“自由否决”，民族间的自由合作像被分割前的波兰贵族间的合作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消灭也许比常识更可取。人类需要政府，但是在无政府状态占优势的地方，人们首先只会服从于专制。因此，我们必须先求政府的巩固，即使它是专制的，因为只有当政府为人们所习惯之后，我们才能希望成功地使它民主化。“绝对的权力在建立组织时是有用的。要求权力服务于一切有关方面利益的社会压力，虽然发展得比较缓慢，但却同样可靠。这种始终存在于宗教史和政治史中的压力，现已开始在经济领域里出现。”^①

以上所说的是领导和服从的人，但还存在着第三种人。

① 伯利和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第 353 页。他们指的是实业公司。

那就是超脱者。有些人有勇气拒绝服从，但他们并没有那种能引起领导欲望的专横。这种人不易适应社会机构，无论怎样总设法觅得一躲避处，在这里他们多少可以享受到独居的自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有时在历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早期的基督教徒和美洲的开拓者都属于这种人。躲避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它有时要求躲避处的绝对僻静，有时则要求修道院的共同孤独。精神上的超脱者包括秘密教派的信徒、无害时尚的追随者和深奥而无关紧要的学问的研究者。物质上的超脱者包括文明边远地区的探寻者和诸如贝茨那样的考察者，贝茨是“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他愉快地生活了十五年，除了印第安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伙伴。隐士性格中的某种东西是多种美德的主要成份，因为它能使人们抵抗声望的诱惑，不顾一般人的歧视或敌意，始终从事重要工作，并且得出和流行的错误相反的意见。

在这些超脱者当中，有些人并非真的对权力漠不关心，只是不能以平常的方式取得权力罢了。这些人可以成为圣徒或异教首领，修道团体的组织者或文学艺术的新派创始人。他们把那些兼有服从嗜好和反抗冲动的人收作自己的门徒；后者可防止正统观念，前者则习惯于对新原则不加鉴别地采用。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真正的隐居者是截然不同的。忧郁的雅克是这一类型人的极好例证，他和好公爵共过流放生活，因为这是流放生活，后来他宁可和坏公爵留在森林里，也不愿回到宫廷。许多美洲开拓者长期忍受艰苦和贫困，但当文明又赶上来时，他

们卖掉田地，继续向西迁移。对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世界所提供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有些人不知不觉地陷入犯罪行为，有些人则倾向于郁闷的和反社会的哲学。他们和同类人接触过多便产生愤世嫉俗之念，如达不到超脱的目的，自然会转向暴力。

在怯懦者当中，组织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对于领袖的服从，而且是因为自己是一群感觉相同的人中间的一成员而感到放心。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有一种热情和安全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集体兴奋是一种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主义、甚至自我保存很容易被遗忘，其间，残忍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种麻醉和其他种麻醉一样，它的快感一旦被体验到，是很难抗拒的，但它后来会导致漠然和厌倦，若要再产生以前的热情，那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

虽然领袖对于这种情绪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情绪也可以通过音乐和群众目睹的兴奋事产生，但是演说家的言辞却是激起这种情绪最简便、最普通的方法。因此，集体兴奋的快感是领袖权力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领袖无需分享他所激起的情感；他可以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那样对自己说：

现在让它去起作用：恶魔，你出发吧，
任你选择你愿意走的路线！